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

第 四 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内部发行)

11.37
5068

天 津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七 九 年 十 月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6 1/4 字数 140,000

一九七九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七九年十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7,000

统一书号: 11072·66

定 价: 0.60 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冀中地区

新闻工作纪实	李 麦 (1)
吉鸿昌将军的生平事迹	傅二虞 (22)
吉鸿昌出国游历的前后	凌勉之 (66)
记我父亲吉鸿昌二三事	吉瑞芝 (84)
吉鸿昌被捕经过	李汉元 (92)
驱逐溥仪出宫始末	鹿钟麟 (94)
天津壬子兵变记事	华克格 杨绍周 (130)
我所知道的袁世凯	何维基 (136)
北洋军阀对天津近代工业的投资	祝淳夫 (146)
军阀王占元经营工商业概况	赵世贤 (163)
裕元纱厂的兴衰史略	王景杭 张泽生 (172)
福星面粉公司始末	籍孝存 (180)

补
白

吉鸿昌軼事一则(83) 吉鸿昌挥毫书写“天
堑飞渡”(91) 天津造胰公司与袁世凯(171)
倪嗣冲在粮食业的投资(194)

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 冀中地区新闻工作纪实

李 麦

一、冀中新闻工作概貌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芦沟桥事变，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节节败退。日本侵略军占领平、津之后，立即沿着平汉、津浦两条铁路线长驱直入，先后攻陷济南、徐州、石家庄、武汉等城市。正当敌人的铁蹄深向我国中原内地，并且得意忘形地喧嚣“赫赫战果”的时候，在敌后，冀中平原的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风起云涌，蓬蓬勃勃地展开了抗日游击战争。

冀中抗日根据地，是北宁铁路平津段以南，石德铁路以北，平汉铁路以东，津浦铁路以西的约有六万平方公里的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它是晋察冀边区的一个组成部分。整个冀中区有七百万人口，有近五十个县，其中有的县被铁路线分割，只有大部或一部分在这个根据地范围之内。共有自然村八千多个。日本帝国主义侵吞华北以后，虽然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个地区已是他们的“王道乐土”，但是他们的势力范围，仅限于铁路沿线及其附近的城镇。一九三八年，冀中广阔的中心地区，则是大块的抗日根据地。

当时，冀中抗日根据地的人民，为了坚持抗战，在“有人的出人，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的口号下，各阶级、阶层的男女老少，全都动员起来，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游击战争。那时候，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在县、区两级都组成了战地动员委员会，不久，迅速建立了各级地方抗日民主政权，游击队、游击小组蜂涌而起，工、农、妇、青、少年儿童等群众抗日救国组织纷纷建立，黑板报、读报组、识字班遍及各村，村村有剧团，遍地是歌声，文化生活异常活跃。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游击战争给冀中地区带来了生机勃勃的新气象。在这个形势下，从冀中区党委到地委、县委所办的报纸，也就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

烽火骤起

一九三八年以后，冀中地区所办的报纸，不下三、四十种。《冀中导报》（刚出版时名《导报》）是冀中区党委的机关报，一九三八年九月十日创刊于任邱县青塔、出岸附近的陈王庄。当时，青塔、出岸一带是冀中区党委、冀中行署、冀中军区的所在地，除了这些党、政、军的领导机关以外，冀中区的工人抗日救国会、农民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等群众组织，以至青塔书店、火线剧社、晋察冀边区银行冀中分行，也都住在这里，再加上冀中军区的驻军和一些训练班，所以当时青塔、出岸一带，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俨然成了冀中抗日根据地的首府。

《冀中导报》刚出版时为日报，铅印，四开四版，总编辑是朱子强同志。当时的铅印设备是由安国天主堂转给冀中人民自卫军（冀中八路军主力部队三纵队的前身）的，开始由冀中军

区的《火线报》使用，一九三八年九月《冀中导报》创刊时，这套铅印设备调给《冀中导报》。

在《冀中导报》创刊前后，许多县委也都出版了油印小报，个别的还有铅印的。有的是四开两版，有的八开四版，一般是三日刊。仅能确切记忆起来和有文字根据的，计有：

《大众报》（束鹿），《号角报》（深泽），《庄稼报》（深县），《七七报》、《大众生活报》（藁城），《建国报》（藁无），《前哨报》（安平），《战斗报》（安国），《烽火报》（博野），《新生报》（蠡县）《奋斗报》（武强），《大众报》（饶阳），《前进报》（献县），《先锋报》（定南县），《前锋报》（河间），《烽火报》（肃宁），《吼声报》（高阳）……。稍后一些时候，冀中的五个地委中，有四个地委也出版了报纸，计有：《洪流报》（六地委，后改为十一地委），《新民主报》（七地委），《群声报》（八地委），《新建设报》（九地委）。只有十地委，因为地处平、津、保三角地带，敌人统治较严，环境残酷，不具备出版报纸的条件。以上列举的都是地方报纸，在八路军中，冀中军区有《火线报》，第七军分区有《战地报》等等。

这时候，敌人统治还只限于铁路沿线，报社多是住在县城或某些大村镇，很少转移挪动。当时报纸的内容，主要是宣传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宣传游击战争的胜利，宣传统一战线政策，宣传持久战思想。至于国际、国内要闻，虽然新华社通讯社一九三七年四月即在延安正式成立，开始向国内发稿，但许多县报都没有抄收延安电报的设备，有些报纸就用收音机抄收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记录新闻。直到一九四〇年，《冀中导报》社出版了《情报》油印，全部是新华社电稿，并向县发

行后，各县报才开始采用新华社的电稿。

办报的人员，几乎全部是土生土长，一部分是小学教师，有的是中学或高小的毕业生。这也和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一样，这些同志完全是摸索着，在实践中逐步学会利用报纸与敌人做斗争的。

游 击 办 报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本侵略军占领武汉，乃回师敌后，妄图摧毁我敌后抗日根据地。一九三八年冬到一九三九年夏，冀中根据地经过敌人先后六次战役“扫荡”，冀中中心地区的县城、重要村镇、交通要道，全被敌人占领，冀中区党、政、军、民开始了打游击、反“扫荡”的战斗生活。因为当时没有经验，开始反“扫荡”时，《冀中导报》社还动员几十辆大车拉着笨重的印刷器材跟着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由任邱县的青塔、出岸向南转移到高阳的边渡口、肃宁的桑园、饶阳的张岗等地。因为敌人“扫荡”频繁，冀中区党委和部队不断连续行军转移，报社已经不能摆开摊子出版铅印报纸了，于是报社就把铅印机就地坚壁起来，把报纸改为油印 坚持出版三日刊或不定刊，随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在肃宁南部于庄、湾里一带活动。一九三九年春，连油印报也不能坚持经常出版，《冀中导报》暂时停刊。这个期间，报纸不能出版，成为冀中人民的莫大的苦闷，报社工作人员也非常着急。到了一九三九年夏天，趁着发大水的战役空隙，《冀中导报》又一面打游击，一面坚持出油印报纸。入冬，因为敌人“扫荡”频繁，《冀中导报》又不得已而暂时停刊。

一九三九年底，适应游击战争的情况，创造了一套新的活

动方式——报社不再跟随冀中区党委打游击，而改为依靠县、区、村的党组织，在群众掩护下独立活动。这样《冀中导报》又复刊了。这时，从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冀中的范瑾同志参加了报社的工作，担任社长，总编辑仍是朱子强同志。《冀中导报》复刊后，仍为油印四开四版。

一九四〇年春，报社由武强、饶阳一带转移到定县南部。从这时起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底，在游击环境中办报有了些经验，冀中的新闻事业有很大发展。《冀中导报》几经筹备，由油印改为石印了，印数大大增加。当时报社除了出版《冀中导报》以外，还出版了《情报》，隔日刊，油印，主要是刊载延安新华社的电讯，供领导机关参考和县报采用。另外还出版了油印的综合性刊物《导报月刊》和青年读物《战斗生活》。并且石印了一批马列著作和重要文章等小册子。一九四二年初，又筹备出版对伪军进行教育的刊物《北斗星》，但是稿件正在准备，“五一一大扫荡”就到来，这个刊物始终未得出版。

这期间，《冀中导报》还在各地委、县委建立了通讯网和发行网。报社内部有负责对外联系的通讯联络科，对外名义是“冀中通讯社”，各县委还设有通讯干事，县也建立了通讯社，称“××县通讯社”，一般有二、三名记者，随县报一同活动，负责向冀中通讯社供稿。各县还设有“冀中导报分销处”负责各该县的报纸订阅发行工作。

报纸改为石印以后，报社的活动方式又有新的变化：编辑、电讯、誊写人员仍然在群众掩护下在村里活动，石印工厂开始也住在村里工作，但是因为它比较笨重，为了便于在反“扫荡”中进行坚壁，避免受损失，石印机遂改为安装在离村庄较远并且远离大道的旷野荒郊，把石印机放在地窖内，反“扫

荡”时，填实窑口，加以伪装。

一九四〇年，《冀中导报》还在饶阳的官厅召开了四天“报纸工作座谈会”，有不少县报负责同志都参加了，在会上讨论了县报的工作任务，交流了编辑工作经验。

这个期间，各县的报纸也都在本县范围内寻找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在反“扫荡”空隙坚持出版。几个地委的报纸，也都有了发展，由油印改为石印了。

一九四一年秋后，《冀中导报》经安国、安平向东转移到饶阳北部。由于冀中根据地日益巩固，局面日益扩大和发展，年底，为集中力量，办好《冀中导报》，冀中区党委决定结束地委、县委的小报，把一部分编辑、记者调到《冀中导报》社。各地委报社的石印工厂，改为《冀中导报》的分印站。但是，一九四二年春，从各地委、县委报社抽调的人员刚刚集中到《冀中导报》社，“五一大大扫荡”就来到了。

地 下 坚 持

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日本帝国主义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那时候，整个冀中地区，碉堡如林，公路封锁沟如网，敌人对冀中进行了频繁地极其残酷的“铁壁合围”、“剔抉清剿”。据冀中军区统计，一九四二年，冀中的敌人建立了据点与碉堡一七五三座，冀中周围共有铁路一五三九里，冀中地区共有公路一五一六六里，平均每六·五平方里即有一里铁路或公路。敌人挖了封锁沟八三七三里，沟宽二丈至四丈不等。点线沟堡互相联络，中间空隙平均有五里左右，最大空隙没有超过十五里以上的。全冀中的土地，就这样被分割成为二六七〇小块，小块中还有交叉公路和封锁沟。我

们的军队和地方工作人员，就穿插在沟线中战斗，新闻工作者，也在点线交错中甚至在敌人设有碉堡的村子里坚持出版报纸。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当“五一大扫荡”开始时，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冀中党政领导机关和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做了战略转移，地方部队化整为零，地方工作人员，则依靠群众，分散隐蔽活动。当时《冀中导报》社决定由极少数人坚持工作，多数人则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三五个人分成一组，分散到自己所熟悉的地区暂时隐蔽。社长范瑾同志随军转移到外线，总编辑朱子强同志带了几位同志，在肃宁南部活动，后来转到肃宁北部军庄、朱庄一带打游击，抓住敌人“扫荡”空隙，出了几期油印的《冀中导报》，主要是新华社的电讯。笔者和编辑科长黄应等同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住在冀中的水乡文安洼边缘大柳河村一所地主的小楼房里，安安稳稳地出版了十几期油印的《冀中导报》临时刊。到了八月初，文安洼地区有些风吹草动，我们随着一支游击小队，穿过敌人的层层封锁线，从文安洼到了冀中的另一个水乡——白洋淀。

当时，白洋淀也是敌人“扫荡”的外线，这里由各地陆续聚集了报社的编辑、记者约有三十多人。八月中旬，报社负责同志来到白洋淀，收容、联系分散的编辑、记者和干部，讨论如何分散出版报纸和向山地转移一部分人员问题。随后，冀中区党委即决定：因为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冀中抗日根据地已经变质，决定《冀中导报》暂时停刊，由各地委组织力量并收容《冀中导报》分散在各地区的编辑、记者、电讯人员分别出版油印小报，并向各地委派回了部分负责干部。当时确定各地委小报的负责人是：七地委，王亢之；八地委，肖竹；九地委，周景陵；十地委，黄应；十一地委，陈述（刘咨周）。

当时，九、十地委都有人在白洋淀。周景陵、黄应同志也在白洋淀，他们就依靠白洋淀和大清河沿岸的苇塘做根据地，分别在九、十地委领导下，蒐罗编辑、刻写人员，筹备电台及印刷器材，先后出版了《团结报》和《黎明报》。王亢之同志在七地委领导下，出版了《黎明报》。肖竹同志在八地委领导下，出版了《胜利报》。陈述同志在十一地委领导下，出版了《团结报》。

这时候出版的油印小报，为了便于携带，便于在青纱帐里或地洞里翻阅，都是八开四版。别看它是那么小小的一张油印小报，在抬头见岗楼、迈步是沟墙、终日枪声响、遍地是谣言的暗无天日的漫漫长夜里，人们见到一张报纸，犹如获得珍宝，往往是传来传去，揉搓得破烂不堪，但是那怕是残缺不全、片言只字，也如同见到一线曙光，增强抗日战争胜利的信心。因为它传播了共产党、毛主席的声音，传播了延安和全国各个抗日根据地的胜利消息，开阔了群众的视野，看见了抗战胜利的光明前途。有一位同志说他一九四二年秋末打游击到安平县境时，多少日子听不到抗日的消息，一天在高粱地里看到七地委的《黎明报》创刊号社论的两行标题：“天将黎明，曙光不远，咬紧牙关，渡过困难”，顿时精神为之一振，抗战胜利信心倍增。针对敌人的欺骗宣传和怀柔政策，这个《黎明报》办了一个副刊，名为《照妖镜》，专门揭露驳斥敌人的欺骗宣传。王亢之同志还针对当时干部、群众的思想倾向，亲自动笔写了《硬骨头与软骨头》的短评表扬对敌斗争的好典型，批判妥协、投降思想，宣传持久战的精神，坚定抗战胜利信心。

在那个艰苦的年代，不管是编辑、通讯联络、交通联系、印刷器材的采购、出版发行与日常生活，都是困难重重。几年

的时光，完全是在枪声和硝烟中度过的，甚至有一段时间，不得不隐藏在地洞里工作，多少日子不见天日。在深夜的星光下行军转移，走在旷野荒郊，环顾四周，往往可以看到三、四个敌伪岗楼的灯光；有时候，敌伪在岗楼里的吼叫笑骂声，都可以隐隐听到。但是尽管那么困难，冀中的新闻工作者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和党的方针、路线的指引，依靠地方党委和村支部的支持，依靠堡垒户舍着全家性命的掩护和生活上的照顾，我们终于坚持度过了最艰苦的岁月，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想起为完成党的新闻事业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的新闻战友。当“五一一扫荡”刚刚开始的时候，《冀中导报》的记者科长沈蔚同志和副刊编辑马驰野同志就牺牲在敌人的枪弹之下了。后来，电讯队队长王文录同志也牺牲了。各地委出版油印小报以后，九地委《团结报》社长周景陵同志于一九四三年春在夜间转移时同敌人遭遇牺牲了。十地委《黎明报》社长黄应同志，一九四三年十月被敌人逮捕；七地委《黎明报》社长王亢之同志，于一九四二年秋末和群众一起被敌人逮捕，当天傍晚在往据点里押送时中途逃脱；一九四三年敌人对七地委《黎明报》所驻的定县东、西赵庄“剔抉清剿”时，电台一位报务员张乡同志失踪。九地委《团结报》一位姓齐的交通员和由《团结报》调到十地委《黎明报》一位姓高的交通员，都在反“扫荡”中牺牲。印刷器材的损失，每个报社都不只一次地发生过。仅就笔者所了解到的情况，就有这么多的损失，实际上，牺牲在敌人枪弹下的同志决不仅仅上述几位同志。

胜利会师

一九四三年秋，林铁同志率冀中区党委从晋察冀边区返回

冀中 加强了对敌斗争的领导，冀中的环境逐渐好转。到了一九四五年，敌伪的有些据点、炮楼，甚至有的县城的敌人，也被迫陆续撤退。冀中中心地区，又成为大片根据地了。根据这个情况，冀中区党委决定，各地委办的小报停刊，由王亢之同志主持，筹备恢复《冀中导报》。于是，各地委报纸的工作人员，一九四五年五月在饶阳以北的宫殿村胜利会师，于六月份恢复了《冀中导报》。社长是王亢之同志，总编辑 魏泽南 同志。

《冀中导报》复刊时所用的报头，是毛主席在“五一劳动节”以前写好的，复刊后开始使用。这时的《冀中导报》仍是石印，四开四版。不久，献县天主堂一套铅印设备调给报社，报纸改为铅印。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整个冀中成为联成一片的解放区。不多日子，报社随区党委由饶阳北上，经任邱去霸县。这次北上，本来是打算于我党我军接管天津后，进入天津办报。但是由于美帝国主义帮助国民党从海上运兵天津，劫夺了抗战胜利果实，我们未得进入天津。所以，《冀中导报》在霸县住了一个多月，又由霸县搬回任丘过冬。一九四六年春，转移到河间城内。次年，为防备国民党飞机骚扰，转移到肃宁县的管中铺，后又转移到饶阳北部。

随着解放区各项事业的发展，冀中的新闻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冀中环境好转后，《冀中导报》编辑部逐步健全了，编辑部内设置了编辑科、采访科和通讯联络科。通联科对外是新华通讯社冀中分社。它的任务，一是开展通讯工作，和设置在各地委的新华社支社联系，并直接处理通讯稿件；二是向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发稿，然后转由总社向全国播发，报导冀

中的各项工作；三是完成新华总社给予的一项特定任务：由于冀中分社处于平津外围，和敌占区来往方便，为帮助总社了解敌占区动态，订了天津《大公报》、国民党机关报《天津民国日报》，从中摘发一些有参考价值的资料、新闻，做为资料发给总社参考。各地委设记者三、四人，对外名义是“新华社冀中分社×支社”，各县委宣传部都设一名专职通讯干事，各部门还设有不脱产的广大通讯员，形成了遍及全冀中的通讯网。

这时候，作家方纪、孙犁、萧殷等同志从别的解放区来到《冀中导报》社，于是编辑部内增设了副刊科，由他们主编出版了副刊《平原》，报纸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了。

为照顾大清河北各县的特殊情况，还出版了《冀中导报》的“边缘区版”。

为开展天津市的工作。一九四五年九、十月到一九四六年春，在冀中区党委天津工作委员会领导下，调娄凝先、董东、杨循等同志，在胜芳出版了《天津导报》，石印，四开四版，同时还印发了一些把封面伪装起来的小册子，由秘密交通送进天津市内，由地下党组织发行。把毛主席的声音、党的方针政策和解放区的消息送给了天津市人民。

一九四七年冬，王亢之同志调《晋察冀日报》社任总编辑，后来，《晋察冀日报》与晋冀鲁豫的《人民日报》合并，王亢之同志又调《人民日报》。这时朱子强同志调《冀中导报》继任社长、总编辑，董东同志调任副总编。在土地会议以后，一方面为充实《冀中导报》编辑记者力量，一方面也从不久的将来在大城市办报的战略思想着眼，选调各地委、县委做通讯工作的部分同志到报社来，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新闻业务能力，这时候《冀中导报》编辑、记者力量逐年增加一批批新生力量，成为

一支洋洋大观的新闻队伍了。

果然，到了一九四八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大、中城市陆续解放，要准备在城市办报了。一九四八年十月，由《冀中导报》抽调崔昶、杜敬等同志去保定，会同晋察冀边区派去的邵红叶、林间等同志，创办了《新保定日报》。夏初，又抽调陈述、刘敏、吴铭、刘贯文等二十多位同志去山西，准备太原解放后办《山西日报》。初冬，又抽调董东、石坚、方纪、孙犁等八十多人，集中到津郊的胜芳，和从《人民日报》调来的王亢之同志、范瑾同志、鲁西良同志，以及由冀察热辽解放区来的朱九思、郭小川同志等，筹备出版《天津日报》。当我们在胜芳正在熟悉天津市的情况，具体做出版报纸的准备工作时，毛主席为报纸写了报头：《天津日报》。天津市是一月十五日解放的，一月十七日，《天津日报》就和天津市人民见面了。

全国解放后，《冀中导报》还输送几位同志到新华总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

据当时留在《冀中导报》工作的同志回忆，一九四八年冬，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时刻，毛主席特为《冀中导报》写了报头，题为：《河北日报》。当时，《冀中导报》社的同志毫无精神准备，党中央、毛主席却早已深谋远虑，准备在解放战争胜利后建立河北省了。一九四九年二月，《冀中导报》随冀中区党委进入保定市，即改用《河北日报》报头，但实际上那时的《河北日报》仍是冀中区党委的机关报。

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在华北解放区联成一片的胜利形势下，冀南、冀东、冀西、冀中等地区实行合并，河北省的统一建制正式建立，冀中的《河北日报》和《冀南日报》、《冀东

日报》合并，这时的《河北日报》才正式成为中共河北省委的机关报。

从此，冀中的新闻工作者，完成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的历史使命。又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军了。

二、在艰苦的日子里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特别是一九四二年“五一大扫荡”以后，冀中平原碉堡如林，沟路如网，被敌人严密分割封锁，敌人又频繁地进行什么“铁壁合围”、“剔抉清剿”，而新闻工作者，不象武装部队可以相机打击敌人，也不象其他抗日工作人员一样，小包袱一夹，就可以远走高飞。打起游击来。报社呢，又是电台，又是印刷器材，行装笨重，行动不便，稿件信件传递，报纸出版发行，完全要在秘密中进行。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中，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报纸究竟是怎样坚持出版的？

仅就笔者亲身经历，把我们在冀中七地委《黎明报》坚持出版的几个片断，写在下面。从这些情况中，大体上也可以反映出“五一大扫荡”以后，其他兄弟报纸坚持出版的情况。

不见天日的生活

在最艰苦的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我所在的《黎明报》社，只有一位社长，一位编辑，两位同志负责誊写、印刷兼发行，三位交通员，四位报务和译电员。我们所住的地方，都预先挖好了秘密堡垒，堡垒户都是贫、下中农或党员的家庭。为了工作方便，一般是社长和三个交通员住一个堡垒户，编辑和誊写员住一户，电台住一户。为了保密，在报社内部，只有

三个交通员知道每一个住处，我们不知道社长和电台的住处，电台也不知道我们和社长的住处。电报稿和外来、外发的信件、稿件、印好的报纸，都经交通员传送，和地委的联系，也靠交通员。

我们在一个地方，住上三天五天，就得在夜深人静时秘密转移。走在路上，报社的所有同志，还可以见上一面，进到村里，就由交通员分头带领我们，分散住进自己的堡垒户，谁也见不到谁了。

进到堡垒户家里，首先把地洞口打开，准备万一第二天发现敌情时进去。如果是第一次去住，还要下地洞检查一下进出口是否合适，洞内能否活动开，洞口伪装得好不好，然后才休息。我们真的遇到过两次，刚转移到一个新地方，才睡下不久，敌人就包围了村子，我们就迅速进入地洞。

情况不太紧急的时候，我们就在屋内工作，把一个小包袱皮摊开，稿件纸张放在上面，编写稿子，刻腊纸，一旦发现敌情，小包袱一收，马上进洞。敌情紧张时，就蹲在地洞里点上小油灯工作，只有吃饭时上来吃顿饭。电台的同志们，把天线伪装好，蹲在地洞里，膝盖上架块木板当桌子，抄收延安播发的新闻稿。

一九四四年阴历春节，我们住在深泽县的大堡，上午十点左右，我们正包着饺子，敌人奔袭包围了村子，我们马上进入地洞，点上小油灯编起报来。

当时除了吃饭、睡觉，其余的时间，就是看电报稿，选编国内外要闻，从通讯员来稿中选编地方新闻，而大量的工作是给通讯员的稿件提意见、写联系信。那时候学习材料不多，白天又不能出屋，实在没有事干的时候，就帮房东烧火、做饭、